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文库

河洛文化视野下 新时期河南文学的乡土风骚

HELUO WENHUA SHIYE XIA XINSHIQI WENXUE DE XIANGTU FENGSAO

刘保亮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文库



河洛文化视野下 新时期河南文学的乡土风骚

刘保亮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洛文化视野下新时期河南文学的乡土风骚 / 刘保亮
著. —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215 - 08079 - 9

I. ①河… II. ①刘… III. ①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河南省 IV. ①I209.9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6115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65788056)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邮电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6.875

字数 210 千字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序 —

刘增杰

十多年前,我在《中原文化圈与 20 世纪河南文学》(《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2 年第 4 期)一文中,谈了自己对乡土文学研究的粗浅看法。认为,对苦难的抗争与对中原文化的反思,构成了 20 世纪河南文学的两大创作母题。“苦难制造了愚昧,愚昧又恶性循环地加重了苦难”,几代中原人“决心结束苦难命运的果敢行动,构成了中原文化重获新生的精神支柱和雄厚基础。”中原作家创作中文化反思力度的不断强化,让我对创作前景充满着期待与憧憬。文章还说,“如果说《黄河东流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对中原人固有观念的反思还只是一个信号;那么,张宇、田中禾、刘震云、李佩甫等人的作品则具有实质性突破的意义。文学反思的程度,反映着中原作家思想攀升境界达到的高度。人们对此应保持足够的关注。”不过,我在文章里对自己提出的刘震云等人的作品“具有实质性突破的意义”的命题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证,所发出的应该“保持足够的关注”的提醒也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十多年后,刘保亮把《河洛文化视野下新时期河南文学的乡土风骚》送到了我的书桌上。河洛文化并不能涵盖中原文化圈的全部,但河洛地区无疑是中原文化圈的核心地区。对河洛文化的深入剖析,有可能会加深人们对中原地区文化、文学的理性认识。因此,我对作者推出的这部新时期河南乡土文学研究专著,有着期待已久的惊喜。



地域是人类的空间组合。不同的地域,有着人类不同的活动形态,不同的文化传播走向、不同的行为系统,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风俗民情、审美意向,给文化、文学打上了深浅不一的地域印记。今天仍具有生命活力的河洛文化(中原文化),它的变革既有迹可寻,某些稳定性的特征也远未消失。华夏民族的文化思维和生存观念,至今还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并且对作家的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表面的、暂时的、无关宏旨的,而是根深蒂固的、鞭辟入里的、入木三分的。从人生哲学、审美情趣到艺术思维方式乃至题材选择、语言运用诸多方面,都给予创作以深刻的影响。

刘保亮敏锐地发现并论证了这一文化现象。他不仅指出地域是一种确定的历史的客观存在,还根据美国学者萨义德《东方学》的观点,认为“审视中国内部的不同地域,不仅是现实的存在,而且也交织着想像的图景”。河洛地区既是黄河与洛水的交汇处,河洛也“不再只是黄河与洛水的交汇之处一块普通的生存繁衍之地,而是人为地想像性地赋予了区别于其它地域的无比优越的心理认知”。刘保亮希冀人们“倍加珍惜今天身后的地域,地域之上的文化以及文学的地域书写”。在这一认知基础上,作者上溯远古,发思古之幽情,对河洛文化表达由衷的敬礼;下视当前,追踪新时期河南乡土文学发展的脚步。围绕阎连科、刘震云、刘庆邦、李佩甫、张宇、李洱等多人的文学实践,发出了个性化的学术新声。全书的总体构想自有其内在理路,这里不展开评论。我最感兴趣的是“新时期河南乡土文学的权力书写”与“河洛土地文化的桎梏”两个部分。这两部分,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乡土文学观和研究的主旨所在。

刘保亮对不是作为偶在的个体而是作为一个群体出场的刘震云等

作家的权力书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辨析,研究他们“如何书写又蕴含怎样的地域文化意味”。刘保亮意识到,作家由乡村到城市,不只是空间地域的迁移,而是文化环境的变换。乡土文学是作家近在心灵远在天涯的回望,是他们哀伤的追忆,也是对自己灵魂所受创伤的抚慰。

村庄空间,是乡土作家的自由驰骋之地。阎连科构建的“耙耧世界”,俨然是一个血亲权力世界,这种以亲缘为基础的血亲权力往往表现为一种封建世袭制的权力交接,谁想进入权力结构之中,首先要从亲缘上成为权力家庭的构成者,一般的耙耧村民则难以摆脱这种封建畸形乡村权力的奴役。李佩甫笔下的乡村政权已经打破了家族式的垄断,那些“乡村政治精英们”着力于乡村基层政权的经营。他们不靠先天的血缘家族而主要靠后天培养的人情关系来施展抱负。《李氏家族》里的李大有,就“善于把乡村道德舆论和集体意识、集体无意识的力量化为己用”。而刘震云“原本带着对现实权力的遗憾失望开始走向对故乡历史的追寻思考”,结果他看到的却是历史与现实的“一丘之貉”。这部专著对河南乡土作家权力书写的解读最具思想冲击力之处在于,它艺术地向读者提示:不论乡村权力者对政权的攫取,还是权力对人性的伤害,“纵观新时期河南乡土文学的权力镜像,权力以无所不在的幽灵的形式控制着乡村社会”,因而,新时期河南乡土作家的小说文本,“悄然转换为苦难的‘大事记’”,“如果说苦难是河洛历史社会的基本境况,那么,新时期河南乡土文学的苦难书写无疑成为历史与现实的浮世绘,特别是河洛作家反复叙述的河南重灾区的‘大饥饿’惨景,是以地域文学作品为并未远去但已被‘集体’忘却的历史作证,那令人锥心的疯狂与疼痛不仅穿透往日岁月而且还将警示未来,这使新时期河南乡土文学的现实精神别具意义。”这一评论,彰往察来,直抵乡土文学深藏的底蕴,它将穿越时空成为对河南乡土文学价值的历史记忆。

《河洛文化视野下新时期河南文学的乡土风骚》对于母爱的评说同样感人至深。在无边无际的苦难面前,在沉重而屈辱的现实面前,个性迥异的女性挺身而出。她们自尊,奉献,牺牲,构成了生命最厚重温

暖的底色,宣示了河洛文化生命力的顽强与坚韧。

我赞赏作者对“河洛土地文化的桎梏”一章的立意。新时期河南乡土文学创作的成功获得了人所共知的赞许,但创作仍然需要时间的过滤。刘保亮对此保持着清醒的冷眼,足够的理性自觉。他开门见山地说:“乡土情感属于那种索价高昂的感情,因为地域特性从来与地方孤立性相因依,这使乡土在给予心灵皈依的同时很可能也在画地为牢。也许一种文学地域风格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地域桎梏的开始。新时期河南乡土文学因了地域文化色彩而在中国文坛卓然独立,但河洛地域文化的封闭、落后、守旧等也使新时期河南乡土作家悄然不自觉地坐井观天,这突出表现于新时期河南乡土文学乡土视野里的城市书写。”这段关于文化桎梏的侃侃而谈自是中肯之论,所举出的河南乡土文学视野下的城市书写是其局限的“突出表现”也大致不错。但是,这种文化桎梏应是属于文学观念性质的整体性问题,城市书写以外的书写,同样弥漫着这种文化桎梏的渗透。这些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显然决非易事。它甚至包括着新时期河南乡土小说书写者整体品格的改良。如,进一步丰富自己农村、城市生活经验,进一步提升文化素质,在创作实践中加强对现代乡土文学开拓者经验的感悟与创造,等等。

二

这里略微叉开话题,说几句鲁迅在乡土文学建设上的贡献,以及鲁迅经验与河南乡土文学创作实践之间所存在的某些内在联系。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一位在乡土文学创作中最早结出丰硕果实的作家。苏雪林在《〈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中说:“鲁迅是中国最早的乡土文艺家,而且是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他认为,鲁迅的《呐喊》、《彷徨》,十分之六七为他本乡绍兴的故事,“自从他创造了这一派文学以后,表现‘地方土彩’(Localcolor)变成了新文学界口

头禅,乡土文学家彬彬辈出,至今尚成为文坛一派势力。”另一位评论家则具体地评论了鲁迅乡土小说的特点与内容。李长之说,“同情充满了他的全作品,虽然有时他为他所同情的人物之堕落而愤慨或激昂”。这位研究者的结论是,鲁迅的乡土小说:“透露了作者对于农村社会之深切的了解,对于愚昧、执拗、冷酷、奴性的农民之极大的憎恶和同情,并且那诗意的、情绪的笔,以及那求生存的信念和思想,统统活活泼泼地渲染到纸上了。”

作为乡土文学创作实践者的鲁迅,同时也是乡土小说理论的建设者。鲁迅对乡土文学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寄居外地,却关心并描写着自己的家乡,“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不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评论到台静农的短篇小说集《地之子》时,鲁迅说,“在争着写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时候,能将乡间的生死,泥土的气息,移到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了”,从题材上对作品的意义作了肯定。鲁迅在《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中,还把《地之子》和柔石的《二月》并称为近两年中的“优秀之作”。在评论王鲁彦的短篇小说《柚子》的时候,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乡土文学“在玩世的衣裳下,还闪烁着地上的愤懑”。对于一些不够成熟的乡土文学作品,鲁迅则对作者坦然相告。在分析河南作家的一部写自己故乡生活的小说集《斧背》存在的问题时,鲁迅指出,这部创作“取材也较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可惜的是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轻小了,使他为公为私打击的效力,大抵失在由于器械不良,手段生涩的不中里”。这话语重心长,对提高乡土文学创作的艺术质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概而言之,鲁迅对乡土文学“将乡间生死”移到纸上内容的强调,对乡土文学“隐现着乡愁”、“闪烁着地上的愤懑”特征的概括,以及提出的乡土文学作者应在艺术上克服“器械不良”、“手段生涩”的要求,

不仅是对当时乡土文学创作的准确总结,对于此后乡土文学的创作也有着借鉴的意义。

从直觉和味觉上,当年的评论家对于鲁迅的乡土小说有过精细的概括。苏雪林说,“因为笔法这样深刻,所以鲁迅文字天然带着浓烈的辛辣味。读着好像吃胡椒辣子,虽涕泪喷嚏齐来,却能得一种意想不到的痛快感觉,一种神经久久郁闷麻木之后由强烈刺激梳爬起来的轻松感觉。”苏雪林的艺术感受是敏锐的,他说出了人们想说而表达不出来的那种乡土文学滋味。新时期河南乡土文学作者,固然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但是,读他们千差万别个性化的作品,或隐或显,或自觉或无意识,或嬉笑怒骂,讽刺谴责,或荒诞反讽,甚至是玩世不恭,却总能感觉到,他们是一群矢志不移的启蒙者,他们的作品同样给读者带来了一种辛辣之后的痛快。他们践行的是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的宣示: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意思是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样,总体来看,新时期河南乡土文学作者,就其直面现实的文学风貌而言,应是对鲁迅倡导的乡土文学精神的一脉相承。他们和鲁迅嫉恶如仇的心是相通的。他们的作品在格调上有着与鲁迅近似的悲凉之气。当然,鲁迅当年所说隐现着的“乡愁”“愤懑”,已经具有了新时代更为丰富的内容了。我甚至认为,刘保亮这部著作本身,竟是对这批作家作品中“乡愁”“愤懑”内容的诠释与解说。

三

我十分看重刘保亮在《后记》中的承诺:“河洛文化博大精深,河南乡土文学根深叶茂。对于生活在这块古老土地的河南人来说,研究河洛文化与河南文学,不仅是一种学术追求,而且还应成为一种心灵皈依。”他的感受真诚深刻。得天独厚的河洛文化积淀,自是地域文学研

究者的用武之地。历来被称为四面环山、六水分流、八关都邑、九州通衢的洛阳，在政治家司马光眼里，这里是“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在文学史家眼里，左思的《三都赋》出，“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唐朝诗人也吟咏“今到白氏诗句出，无人不咏洛阳城”；白居易 73 岁在洛阳捐资治理伊河险滩的故事在民间传为美谈，他临终前留下诗句：“心中别有欢喜事，开得龙门八节滩。”这些，给从古至今的伊洛人留下了久远的怀念。

刘保亮所论及的这批书写河洛地区现实生活的作家，后生可畏。人们有理由对新时期河南乡土文学作者、以及《河洛文化视野下新时期河南文学的乡土风骚》的作者，寄予新的期望。

序 二

阎庆生

在中西二元对立的文化逻辑中产生的中国新文学,当它毅然而决然地拒绝了传统文学的遗产,全身心地拥抱西方文明的时候,一个根本性的焦虑就相伴而生:新文学的“主体性”何在?换句话说,新文学想要摆脱“姗姗学步”或者“牙牙学语”的状态,大踏步地向前,面向全世界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首要的是发展并完善自己的“新质”。这种新质既迥异于传统文学,又与他国文学有着本质差别。正是这种“新质”方能确立新文学的“主体性”。对这种“新质”的追寻、探求与创造,既是“五四”一代先贤们的焦虑,也是他们为之奋斗的文学理想。这种“新质”是什么?周作人、茅盾、郑振铎、上官箬等人的答案是一致的:“地方性”。1923年,周作人在给刘大白《旧梦》所写的序中说:“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否则是‘拔起了的树木’,不但不能排到大林中去,不久还将搞枯了。”到了1943年,上官箬在一篇《揭起乡土文学之旗》的文章中大倡“乡土文学”,认为乡土文学的实践“先应该来强调作品的‘地方色彩’”,并认为“强调地方色彩是现实主义的基点”。这些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和理论家们对文学“地方趣味”“地方色彩”的重视与提倡,无疑把握住了现代文学发展的核心要义。中国现代文学若要以一种独立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须将“地方性”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

面深度展开。

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现代文学“地方性”的重视与研究远远不够。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地域文化、地域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方得到学术界的青睐,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其中,尤以地域文化对文学之影响的成果为最众。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和研究格局中,刘保亮博士将眼光聚焦在了河洛文化与河洛(中原文化圈的核心地域)文学这一领域,他献出的这本《河洛文化视野下新时期河南文学的乡土风骚》,当为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富有特色与深度的厚重之作——我以为它会对于地域文学的研究起到相当的推动作用。

说它有特色,首先是因为它选择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域为研究对象。众所周知,南宋以前河洛地区长期或为王都或为陪都,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它孕育了丰富而灿烂的文化成果,自然值得深入研究。这样,学界对河洛文化和河洛文学的研究,基本上就表现为对一种古代的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那“当代河洛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如何确立?或言之,“当代河洛文学”研究的意义何在?保亮立足于文化传统的延续性与流动性,深刻地剖析了漠视北宋以后的河洛文化与文学这一文化心理背后的文化霸权与文化基础主义的倾向,指出“研究当代河洛文化与文学,不仅是文化与文学长河意识的逻辑发展和内在吁求,而且也是重建河洛人文传统的时代课题和现实需要”。尤值注意的是,他不将“当代”视作一种锁定的稳定状态,而是将其看作悠长文化之流中的结点。关注“当代”,既能追溯过往,又能开启未来。由此,“当代”就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种观察的视角、价值的立场了。对“当代河洛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就不仅仅具有了填补了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空白的意义,而且显示出一种可贵的文化反思与重建意识,一种强烈的与传统和当下积极对话的冲动。

本书的特色之二是对“建构主义”的文化观念和方法论的充分汲取和很好运用。以往对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常常有意无意地对

“地域文化”做本质主义的界定。保亮则受到后现代主义文化观念的影响,将“地域”、“地域文化”均视作建构主义的概念。从这一文化观念出发,他首先颠覆了文学史中的“元叙事”,即地域文学研究中对“元地域”的追求。他认为历史意义上的地域文学并不存在所谓的“真实”面目,其原初面貌应该是线团化、碎片化的,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那种试图揭示历史与地域文学史‘真’面目的想法不过是一种目的论预设”。这无疑是一种后现代的历史叙事理论。且不论这一理论的得失利弊,它却为保亮提供了展现河洛文化与文学多样性、复杂性的理论前提。某种意义上,历史的“真实”呈现恰恰在于对其复杂性与多样性的最大揭示。其次,建构主义的文化观念使他重新思考河洛文学的本质特征。既然文化不是一个固定的封闭的意义单元,也不具有恒常不变的内涵,那么河洛文化的本质也不具有永恒的特性,而是不断生成、发展、变动、重建的。或者说,河洛文化与文学并不存在一种“在那里”等待被“发现”的本质,而存在一种不断被“建构”的本质。在漫长的文化长河中来审视河洛文化的本质,应该能看到河洛文化是在与社会现实的交互中,在与异质文化的磨合中,在一方面容纳吸收一方面摒弃拒绝,一方面坚守自我一方面又否定自我的历程中建构起来的,它的本质是变动不居的。也正因此,河洛文化才体现了文化传统的延续性,才保证了它自身的生机与活力。在这样一种“大文化”“长时段”的宏阔视野中,保亮对河洛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是别开生面的。“建构主义”文化观念和方法论的运用,使论文在分析作品中的时代背景、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时,注意到了事物相貌的复杂性,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流动性、矛盾性,乃至某种荒谬性。河洛大地的世代苦难,使生存于此的民众,其身心受到了深深的戕害,人性往往被扭曲。他们的身上,既有传统的美德,又具有非常人所能想象的精神疾病。如果说传统的“官本位”观念主宰着河洛作家笔下一些人物的价值观、婚姻以及其他行动,那么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受活》小说里的柳鹰雀就会弄出诸如在乡下建造“列宁纪念馆”“绝术表演”这样的喜剧。善与恶两端,经常相互纠缠,

难分难解。《丁庄梦》里写道,因为闹“热病”(艾滋病),面临死亡恐惧,丁亮和玲玲就“大胆妄为”地住在一起,由此“热病的死亡恐惧既敞开了人性的幽暗,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日光流年》里的司马笑笑,被保亮视作“也许是阎连科耙耷世界中最光彩照人的形象”,是“一个充满自信、富于侵犯性的天父原型”,“一个孤独的失败的英雄”。刘著的上述分析,紧扣村民的生存环境和故事情节的进展——这是一个人物性格的建构,微观的建构。而在宏观上,河洛作家笔下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不同家庭之中的人物、故事,虽然从逻辑上大体可以归入几个类型,围绕着几个母题并演绎为一些复杂的变奏,但其个别形态却是形色各异,大异其趣,溢出人为的逻辑框架的。应该说,建构主义固然印证了哲学上“个别比一般丰富”的原理,但它的深刻意义却在于创作和研究时可以真正地从生活和文本出发,不为固定的、流行的图式所束缚,而又能揭示生活发展的内在脉络、线索及神髓。还应该指出,刘著在运用建构主义方法时,避免了杂乱之弊。对于一些幽暗、模糊、交叉之处,他总是从理论上予以辨析,做好质的定位。比如,在分析新时期河南乡土文学性爱叙事伦理的性征书写时,他区分了阎连科作品的“生理的宣泄”和刘震云作品的“身体政治学的隐喻”,但作为一种整合,他征引了福柯对“肉欲(Tlesh)”“性征(Sexuality)”“性(Sex)”的细致区分。由于作者的独具会心,他发现了《丁庄梦》《风雅颂》在性征书写上的“旁逸斜出”,还从主人公杨科的言行窥见了《风雅颂》文本的“裂痕”,且作了切当的心理分析。从而在这些地方,我们似乎领悟了西方现代理论的生命力。

批判精神的高扬,是刘著的另一特色。我记得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特别意义上的批判时代,所有的一切都要必须经受批判。马克思也论述道: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全部学说的生命力和灵魂就在于它的批判精神。当然,我们不能对“批判”做一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理解和功利主义的定位,而应该将其视为深切的现实关怀精神和责任

意识,以及对独立自主的价值立场的坚守。在这一点上,“批判”精神实际上就是一种“启蒙”精神。刘著对河洛文化与文学的研究,自始至终贯彻着一种“批判”意识,坚守着独立而清醒的价值理念,这一点十分难得。在对当下河洛文学的权力书写、叙事伦理、道家话语的论析中,保亮既看到了河洛文化传统对河洛文学的滋养,同时又尖锐地指出了作家们的文学叙事背后潜藏的矛盾含混的情感态度、强烈的男权观念等诸多问题,提出河洛文学深受王都文化的影响,“传达出对权力的暧昧态度”,“对权力抱有一种温情地理解”,而“我们却必须抵抗并坚守人文精神的底线”。不仅如此,保亮还特设一章,专论河洛土地文化的桎梏。他深刻地指出:“新时期河南乡土文学的‘现实精神’是一把双刃剑,一面它使河洛作家怀着浓烈的乡土情感,以与生俱来的、切身体会的乡土经验,逼真地呈现出河洛的生存镜像;一面它又可能使其停留在地域文化内部,所关注的、所理解的只是河洛‘现实’的存在和这存在的理由,而没有获得一个宏阔的瞭望视野和普遍的精神支撑,以达到对此岸世界的超越。”这般的有见地、有深度的观点源自保亮对人文主义的文化价值立场的坚守。不专注于“展示”,而倾心于“辨析”;切忌于“溢美”,而不忘“切弊”,这应是本书最大的特色。问题在于,刘著的批判,是具有理论根据的,充分论证的。比如,刘著第三章《新时期河南乡土文学的叙事伦理》,在论述河洛文学的乌托邦叙事伦理集中于女性形象时,既指出乌托邦是真实的,又强调“女性们虽然承载了道德责任与义务,却泯灭了自己的个性与作为一个独立人的价值”,“也许女性的文学虚构愈加完美,愈是显出她们人格的残损”,“对女性圣洁化的叙述处理不仅传达了文学的伦理审美想象,同时也在女性崇拜的背后以‘墨写的谎言’暗中掺杂了男性的期待和欲望,那对女性传统美德的赞美,实质上潜在地游荡着理学纲常名教的魂灵。”——此种分析,应该说是深中肯綮、笔锋犀利的。由此显现出的,是保亮对河洛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忧思,是他独立而又中正的文化立场。这是一个青年学者最为宝贵的精神品质。

另外,这本书的语言,是精练而又优雅的。逻辑非常清楚,用词很是准确;难得的是,他的笔端又常常带有淡淡的抒情意味,耐人咀嚼。读起来,我有时不免击节赞赏,情不自己。再加上他对作品场景的分析,对人物心理的分析,对一些重要意象的分析,能够抓住要点,故往往能精妙入微,引人入胜。如果说,刘著的逻辑张力似乎过盛,那么他的这些探到幽深之处的优美文字,却恰恰弥补了上述瑕疵。学术论文的写作,语言并非不重要;别的专业姑且不论,就文学研究而言,研究者的语言功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是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语言功力彰显着、表征着研究者整个的文学素养。

这本书是在保亮的博士论文《河洛文化视野下当代河洛文学研究》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为结项成果的。他的论述是颇有深度的,这是我在2010年春读完他的博士论文后的第一反应。保亮在来陕西师大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就在河洛文化与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来陕西师大文学院后,他又能孜孜不倦、刻苦勤勉,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不少开拓性的成果。他对学术的认真、痴迷,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我又细读了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这本专著,愈加强化了我对其“颇有深度”的体会。这种“深度”表现在他能吃透中西文化与文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概念,形成自己的言说范式。对西方的理论,他并不生吞活剥、死搬硬套,而是能融会贯通、为我所用。如他在绪论中对“想象的地域”“地域的时空问题”“地域作家的文化身份”问题的界定,既吸收了西方文论的精髓,又提了自己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理论的深度并没有减弱保亮对文本的重视,他对文本的挖掘的深度也让我赞叹,文化与文学深层互动的奥秘,正是在大量的文本细读中被一一揭示出来的。

以上我简要谈了阅读保亮的专著《河洛文化视野下新时期河南文学的乡土风骚》之后的感受,它的优点当然还有很多,细心的读者可以去一一品味。如果非要说出这本书存在的缺点的话,我认为它个别地方过多地受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文化固然不是恒定不变

的,是“建构主义”的;但不应将这种“变”过分化。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总有一些普遍的恒常的东西(或价值、或信念)留存下来,由此而形成“传统”。文化本身就是磨合和选择的结果。因此,保亮若能在“变”与“不变”的张力中审视河洛文化与文学,应该会有更多的发现吧。这算是我对保亮今后学术探求的美好期待。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看到他在河洛文化与文学的研究领域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是深感欣慰和自豪的。衷心希望保亮能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越走越宽,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